

## 孟浩然辞去张九龄幕的时间与原因

魏景波

**内容提要** 孟浩然晚年短期入张九龄幕，是其生平重要经历，为学界所关注。但辞幕时间及原因，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。通过考察孟浩然在幕时期的诗歌唱和，可知其在幕时间至少为一年零三个月。辞幕原因则是由于张九龄的政治失意，引发了孟浩然的仕途无望，因心灰意冷而辞幕还家。

**关键词** 孟浩然 辞幕 时间 原因

孟浩然生平行止的研究虽然有长足的进展，但还存在不少分歧，特别是关于何时辞去张九龄幕府与在幕为时之长短，以及辞去之原因，前二者出入较大，后者则语焉不详，三者均值得继续考察推究。

对于孟浩然何时入张九龄幕，学界看法一致，即张九龄贬荆州长史之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夏季。陈贻焮《孟浩然事迹考辨》中说“孟的《荆门上张丞相》说‘共理分荆国，招贤愧楚材。……始慰蝉鸣柳，俄看雪间梅。四时年籥尽，千里客程催。’据首二句，张到任后似即辟孟入幕。张四月贬官，五、六月或已抵荆州（今湖北江陵）任所。据后四句，孟似于这年夏末秋初（‘蝉鸣柳’）捧檄入幕，而年终即思辞归襄阳（‘雪间梅’、‘年籥尽’、‘客程催’），不久当即还家。在荆州幕不到一整年。”<sup>①</sup>按此诗意蕴，从荆州至襄阳只有四百多里，“千里客程”非指“辞归襄阳”。且言“客程”而非“归程”，故当指诗人因公使扬州事。从荆州至扬州一千五百里，举其整数正是“千里”之遥。而入幕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夏末秋初，则为学界接受。论者又据张九龄《荆州谢上表》，说贬命下于四月十四日，“即日上路，星夜奔驰，以今月八日至州”。长安至荆州一千六百多里，则谢表当上于五月。而孟浩然最早应在夏季入幕，刘文刚《孟浩然年谱》、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、顾建国《张九龄年谱》等均持此说。

陈文所言“不久当即还家”，又补充说“他于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立春后不久辞幕归家”，其依据是“去年岁暮上诗（《荆门上张丞相》）辞归，这时犹在江陵，想离行期不远了”。上文已言孟诗的“四时年籥尽，千里客程催”，并非言思家辞归，而是谓因公使扬州事，说亦见王波《孟浩然行年新考》<sup>②</sup>。此行途径彭蠡湖、庐山，孟之纪行诗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有云“我来限于役，未暇息微躬。淮海途将半，星霜岁欲穷。”观末句知作于年终，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即系此诗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。淮海指扬州，因谓扬州北临淮水，东南至海。佟培基《孟浩然诗集笺注》说“孟浩然此次行役，自故乡襄阳经彭蠡，由泗入淮，至此走了一半路程。”似乎把此行看作个人行为的江南漫游。孟浩然对陶渊明很为向往，在《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》曾言“尝读高士传，最嘉陶征君。”陶渊明作桓玄幕僚时，奉命从江陵使金陵，在返途作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就说过“自古叹行役，我今始知之。”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又说“怀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。”在作刘敬宣参军时

<sup>①</sup> 陈贻焮《孟浩然事迹考辨》，《文史》第四辑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《湖北大学学报》1991年第6期。

又奉命使都，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亦言“伊余何为者，勉励从兹役。”对此孟浩然当会了然于心。而且在他多次东南漫游的诗中，从来没有用过“行役”或“怀役”、“羁行”一类说法。从孟诗“限于役”、“未暇息微躬”看，则为奉命出使无疑。从荆州至扬州，中经彭蠡湖，即今之鄱阳湖，亦为行程之一半，故谓此行为自故乡出发的江南漫游，则有误。

特别是孟浩然与宋鼎的唱和之作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，足可证明孟并非于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立春后辞幕归家。李浩《孟浩然事迹新考》以为“宋大使疑指宋鼎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二载其《赠张丞相序》曰‘张丞相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，又代余为荆州。余改汉阳，仍兼按史，巡至荆州，故赠之。’又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四‘山南道随州’：‘（唐城县）开元二十四年采访使宋鼎奏置。’知宋鼎在张九龄被贬荆州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）之前，领荆州兼山南道采访处置使，即孟诗所说的‘大使’。”并进一步考断“据前宋鼎序知张九龄代其领荆州，则他们唱和时间的下限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。”<sup>①</sup>盖因未细读宋鼎诗，所以结论的下限时间有误。

按张九龄有《酬宋使君见赠之作》，孟浩然亦有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曰“返耕意未遂，日夕登城隅。谁谓山林近，坐为符竹拘。丽譙非改作，轩槛是新图。远水自嶓冢，长云吞具区。愿随江燕贺，羞逐府僚趋。欲识狂歌者，丘园一竖儒。”皆为同一时期的唱和之作。而宋鼎诗《赠张丞相》发端即云“汉上登飞幘，荆南历旧居。”是说从改领的汉阳郡而来，来到荆州之南曾住的旧居。此即其序所言“余改汉阳，仍兼按史，巡至荆州，故有此赠。”宋鼎此来，按公务巡行至荆州。故其诗接云“已尝临砌橘，更睹跃池鱼。盛德继微眇，深衷能卷舒。义申蓬阁际，情坦庙堂初。郡挹文章美，人怀燮理余。皇恩悦昭亮，岂厌承明庐。”尝橘睹鱼言九龄治绩，又谓接己任的张丞相肯定会治理得舒卷裕如。过去在蓬莱阁校书，朝廷共事，相处甚洽。如今文章之美聚集于此，人人都会感受到恩德。皇恩悦若沐浴，张丞相一定会返回帝京中枢。“已尝”、“更睹”云云，显然是巡察后的表彰语。如果把此诗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之前，怎么能说“已尝临砌橘”，即就是尝到，也应是宋鼎的政绩，而非张九龄的“盛德”。而且张九龄的《酬宋使君见赠之作》说“罢归犹右职，待罪尚南荆。政有留棠旧，风因继组清。高轩问疾苦，烝庶荷仁明。衰废时所薄，只言僚故情。”看“政有”两句，是说自己接任后，还能感受到宋之前任政风。观“高轩问疾苦”两句，可知宋鼎是以按察使身份巡至荆州，就再显明不过了。又据《册府元龟》卷四八，宋鼎开元二十七年自广州刺史改三路府长史，故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把他们的唱和系于开元二十六年，当正确无误。孟浩然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，无庸置疑亦当作于此时。换言之，至少此年秋橘成熟的九月，孟尚在张的幕府中。

孟浩然何时离开张九龄的幕府，史料无载，从孟诗也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则在“开元二十七年四月”条说“夏，孟浩然自荆州归，在襄阳，有诗送萧诚赴荆州。”因据《岷山送萧员外之荆州》的“涧竹生幽兴，林风激管弦”，以为“当为夏日作。本年秋，孟浩然在襄阳有诗送王昌龄，其返襄阳，约在本年夏”。如此，则孟从开元二十五年夏入幕，至二十七年夏离幕，为时整整两年。此一结论的前提是“开元二十七年正月”条所言“张九龄在荆州，有春朝对雪诗，孟浩然和作。”实际此条的时间与史实有出入。张九龄《立春日晨起对积雪》说“忽对林春雪，瑶华处处开。今年迎气始，昨夜伴春回。”孟浩然酬作《和张丞相春朝对雪》亦云“迎气当春立，承恩喜雪来。”所谓“迎气”，即立春日迎春。而“今年迎气始”的迎春之制，起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。何格恩《张曲江诗文史迹编年考》谓张诗“当作于贬荆州以后。《旧唐书》卷九《玄宗纪》：‘开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，亲迎喜气于东郊，祀青帝。’此诗当撰于本年正月。”<sup>②</sup>熊飞《张九龄集校注》卷四

① 李浩《孟浩然事迹新考》，《唐代文学研究》第一辑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16页。

② 何格恩《张曲江诗文史迹编年考》，《广东文物》中册卷七，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版。

据何考又增一证 “《唐会要》卷十上 ‘开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 ‘自今已后，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，亲迎春于东郊。’” ‘今年迎气始’，指今年首次执行唐玄宗的这道迎气诏令，故系二十六年春，是。”<sup>①</sup> 何考、熊注系年确凿不移。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系年恐有误差，向后推移了一年。如此看来，谓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尚在幕府，就失去了根据。

综上可知，孟浩然于开元二十五年“蝉鸣柳”之夏末入张九龄幕府，至次年“尝橘”之秋季尚在幕府中，至于以后何时离开，比较具体的时间只能付诸阙如。或者说，孟在张幕之中，至少有一年三个月的时段，这或许不会有何大误。

关于孟浩然离开张九龄幕府的原因，论者亦未予以应有的关注。谭优学《孟浩然行止考实》说在开元二十六年“似已回襄阳养病”<sup>②</sup>。孟浩然在幕府所作诗，未言及病，故语气在疑似之间。《唐才子传校笺》也只说“回襄阳养病”。刘《谱》“开元二十六年夏”条说“浩然患背疽时间，书均不载。考本年春，浩然尚在张九龄幕府中，尔后活动突然中断，而从浩然诗和行动看，他并无马上离开荆州之意，其离开显然系背疽发作。”把孟浩然在幕府可考的时间下限断于本年春，离幕原因断为背疽发作。而“开元二十五年冬”条云“还襄阳，有和鼎诗”，把孟浩然和宋鼎诗看成年末在襄阳故里的遥和。理由是“浩然还乡，是度春节”，而且认为“所建亭，似应成于春节之前，诗也应作于春节之前”。然此诗发端即言“返耕意未遂，日夕登城楼”，登楼者明显包括孟本人在内，诗作于荆州无疑，时在本年“尝橘”之秋季，已见于上文。至于说亭建于春节前与孟回家过春节，亦无任何依据。

至于说孟辞幕因了“背疽发作”，亦属于臆测，同样没有依据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《唐代文学史》亦谓“因病辞职回家，结束了为时一年左右的幕僚生活”<sup>③</sup>，亦为估摸约略的说法。另外一说是孟对“幕僚生涯颇感厌倦”，于开元二十六年春后，“未几辞归襄阳”（王波《孟浩然行年新考》），辞幕时间则采陈文。第三种说法则语焉不详，如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

辞幕原因未见明载，孟诗亦未显言，我们只能从孟浩然入幕前后的行踪与诗作寻绎其心迹，作大致的推测。孟浩然曾于此前之开元二十二年再赴长安求仕，不料失意而归，颇为愤懑。作为“与孟浩然为忘形之交”（王士源《孟浩然诗集序》）的张九龄，时为执政之宰相，当有所不安。大约作于此年或稍后的《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》说“吾观《鸛鹑赋》，君负王佐才。惜无金张援，十上空归来。弃置乡园老，翻飞羽翼催。故人今在位，歧路莫迟回。”就认为张九龄会“沉沦拔草莱”，当提携布衣之士。张之招孟入幕，很自然地重又点燃了孟浩然的仕途热望。因此，孟浩然入张九龄幕，不仅是为了从事幕佐之职，而是要实现早年“冲天羨鸿鹄”与“望断金马门”的理想与期望，渴望借助入幕，张九龄能“一荐甘泉赋”（《田园作》），实现多年之夙愿。张九龄虽由相位贬谪下野，但在当时仍具有极大的政治声望。孟浩然时近知天命之年而未沾一仕，张九龄对他的吸引当具有极大的力量，所以诗中充溢企求与热望。

孟浩然入幕后涌起强烈的大展鸿图欲望，还可在当年早秋所作的《和卢明府送郑十二还京兼寄之什》中，看出端倪“洞庭一叶惊秋早，瀟落空嗟滞江岛。寄语朝庭当世人，何时重见长安道？”语气之迫切，颇有些急不可待，看到别人还京，自己亦跃跃欲试。一味依靠张九龄援引举荐，似乎都有些间接，亟欲与当朝执政者对话，因为他毕竟是四十九岁的老布衣了。

在入幕当年冬季所作《荆门上张丞相》，可见出情绪颇为欣喜兴奋“共理分荆国，招贤愧楚材。召南风更阐，丞相阁还开。觐止欣眉睫，沉沦拔草莱。坐登徐孺榻，频接李膺怀。始慰蝉鸣

① 熊飞《张九龄集校注》卷四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307页。

② 谭优学《孟浩然行止考实》，《西南师院学报》1978年第1期。

③ 吴庚舜、董乃斌主编《唐代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298页。

柳，俄看雪间梅。四时年籥尽，千里客程催。日下瞻归翼，沙边厌曝鳃。伫闻宣室召，星象复中台。”认为张九龄聘请幕佐从事是招贤共治，拔擢草莱，让人笑上眉梢。并以徐稚喻己，视张为好贤的陈蕃，或者为声望极高之李膺，故一入幕就有“始慰”之感。末四句言：张不久将归翼于日下帝都，不会久处江边荆州贬所，就像贾谊一样受到皇帝重视，从而恢复相位。作于同时的《陪张丞相登嵩阳楼》亦言“客中遇知己，无复越乡愁”，则把张九龄视为人生感遇之知己，心情还是很愉快的。

然而，他从入幕的夏季等到年终，却没有什么好兆头，只等来奔波扬州的公使。作于岁末的奉命公使扬州途中的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，伤感于行役限程的“未暇息微躬”，表露羁役限程之劳苦，触景生情。“久欲追尚子，况兹怀远公”，已然滋生了归田之心，并在诗末宣告“寄言岩栖者，毕趣当来同”，说出完这趟公差，当辞幕归隐，看来这时的心情已不那么愉快。此后返回荆州所作的《溯江至武昌》说“家本洞湖上，岁时归思催。”所谓洞湖，就是他在《寻张五回夜园作》所说的“闻就庞公隐，移居近洞湖”，——在他的家园附近。故次句“归思”，即思归家园。

此年岁末陪从张九龄观猎、游览、祠祭，诗作中也表露出失望之意，《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》说“从禽非吾乐，不好云梦田。岁晏临城望，偏令乡思悬。参卿有数子，联骑何翩翩。世禄金张贵，官曹幕府连。……何意狂歌客，从公亦在旗。”开端即发不喜游猎而有乡思之悬，次言幕府多为世禄金张子弟。末言像自己这样原本“狂歌”在野之人，于此就不那么合拍。孟浩然原本骨傲狷介，自视甚高，不愿以入幕作为仕进常途，只是因为对张九龄抱有极大的期望才屈身入幕。然入幕至今，希望似乎没有任何着落，故此诗末尾颇有“争食羞鸡鹜”的懊恼。

次年秋所作的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一则曰“坐为符竹拘”，再则曰“羞逐府僚趋”，在幕的烦闷郁积在心，溢于言表。而“欲识狂歌客，丘园一竖儒”，则与前诗结尾具有同样的桀骜不逊。可见这时他对幕僚职务颇感拘束，决意返耕归田，更可以看出对原来倾心并寄予热望的张九龄，此时已深感失望而不无微词。

在幕府大约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里，经历了由热望——失望——绝望，以至于懊恼的心路历程，他决然辞幕而归。张九龄及幕府亦无送别之诗，对这次不愉快的求仕活动，他自己似乎也不愿意留下告别的篇什。如前所言，有可能在开元二十六年“尝橘”的秋季，因为难以忍受“符竹拘”与“府僚趋”，快快然辞幕而归。

至于他的病，或者具体说“背疽”，最早记载见于开元二十七年秋季的《送王昌龄之岭南》，说自己“已抱沉痾疾”。如果说从上年秋后返归故里所患，至此一年亦可称为“沉痾疾”。痾疽为细菌感染的炎症，属于急症，一年未痊愈，即为“痾疾”。此年孟浩然已届五十一岁，仕途看来彻底无望，心情大坏，疾病自然滋生。再者，在他的荆州诗里没有任何关于疾病的表述。若病生于幕僚期间，自然会以病辞幕，理由冠冕堂皇，也会自然见于诗中。所以他的辞幕更可能是负气带性的“心病”，又没有正当理由，因而诗里就不必提及了。

另外，张九龄在荆州所作诗里表露出的政治心态，也加剧了孟浩然的失望之情。张九龄的《荆州作二首》充溢着被排挤的沮丧与苦闷。其一云“千虑且犹跌，万绪何其纷。进士苟非党，免相安得群。众口金可铄，孤心丝共焚。意忠仗朋信，语勇同败军。”他因所举荐的周子谅谏阻牛仙客入相，触怒玄宗，又为李林甫所谮，终于被疏远，只能以“幽兰只自薰”洁身自怜自慰，已无力有何进取。其二写得更为凄凉悲伤“谁谓诚不尽，知穷力亦殚。”不仅感到精疲力尽，而且精神上受到打击与摧残“浩荡出江湖，翻覆如波澜。心伤不材树，自念独飞翰。……况乃山海泽，效无毫发端。内讼已惭沮，积毁今摧残。胡为复惕息，伤鸟畏虚弹。”写自己感到孤独无援，于贬所更难以有所作为。忧谗畏讥之心，惊弓自哀之意溢于言表。入幕前的孟浩然，对张九龄罢相前后的险恶政治处境并不十分了解，由于受乡野处境的限制，也不会看到张九龄的罢相是朝政衰败的转关。入幕之

后朝夕相处，对幕主心态应当逐渐有所洞悉。起先，对张九龄的失意曾有劝慰式的鼓动，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的《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》说“谢公还欲卧，谁与济苍生”，对张九龄的心灰意冷，仍以东山再起的谢安来激发振作。似乎对李林甫垄断朝局之势不甚明了，而对故人张九龄仍然寄有殷切的希望，以为张还会东山再起，再度入相。但当他看到张九龄孤独忧伤，不仅在贬所“效无毫发端”——彻底失去政治上的发言权，而且被“摧残”得像“伤鸟畏虚弹”的时候，他希冀能得到举荐的热望，便逐渐冷却。觉得跟随毫无作为的幕主，恹恹趋走，与“端居耻圣明”的观念相差太远，只是一种“争食羞鸡鹜”的拘束与无聊。于是自视为“冲天鸿鹄”的孟浩然，便不得不快快然飞回到他的故园。

总之，一年三个月的幕佐生涯不算太长，他的辞幕并非对“幕僚生涯感到厌倦”，至于“因病辞职回家”的可能性也不大。张九龄的政治失意，引发了孟浩然的仕途无望，因心灰意冷而辞幕还家，从本质上讲，都是李林甫专权下酿成的连锁式悲剧，所以归宿也有几许相似之处。当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春夏间，当王昌龄自岭南贬所兴冲冲地北归途中，与挚友孟浩然会于襄阳，“时浩然疾疹发背，且愈，相得欢甚，浪情宴谑，食鲜疾动，终于冶城南园”（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），几乎与五月七日病卒于韶关曲江私第的张九龄，先后相差没有多少日子。就在这年此前的春天，李白路过襄阳，有《赠孟浩然》诗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挹清芬。”几乎成了孟浩然的盖棺定论。张、孟的辞世，标志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即将谢幕，也显示了诗史上的前盛唐也将成为逝去的时代。接续的后盛唐诗的辉煌却与天宝时期的朝纲衰败，形成二律背反两极分化的局面，这与前盛唐政治与诗歌的开明高朗的一致性，都有了一定的区别。

〔作者简介〕魏景波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发表过论文《强至诗小议》等。

（责任编辑 刘京臣）

• 学术信息 •

## 《文学遗产》官方微信平台正式开通

“文学遗产”公众平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主办的学术信息发布平台，已于2014年8月16日正式开通。

微信平台旨在分享学术动态，促进学术交流。欢迎关注。

订阅号：wenxueyichan

二维码：



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

2014年9月15日